

(日)早坂茂三著
赵宝智 张学之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中角 荣秘闻

田中角栄秘聞

〔日〕早坂茂三 著

赵宝智 张学之 译

中國文海出版社

田中角荣回想录

早坂茂三

小学馆 1987.5.20

田中角荣秘闻

〔日〕早坂茂三 著

赵宝智译
张学之译

*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售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2插页 155千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

ISBN 7-5059-0960 6/1·690 定价：2.90元

前　　言

田中角荣是划时代的天才政治家，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政治史谱写了光辉而又悲惨的一页。他走马灯似地度过了毁誉褒贬的岁月，终于被脑血栓征服倒下了——这是1985年2月27日，是年66岁。从此，政治家田中角荣的声音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民众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冒昧地讲，震撼日本政坛的“田中时代”已经基本结束了。现住在东京目白台的田中——我的主人，正以天生不屈不挠的精神一心一意地养病，身体在顺利地康复中，我确信，总有一天神仙会保佑他，让他重新在人们面前讲话，作为政治家发表演说，表达自己的意愿。但是，再现昔日之风采、统帅全国，恐怕是大象钻针眼——根本不可能了。想到这些，我百感交集，难以言喻。

形成战后第二届保守政治秩序的“三角大福中”（即：三木武夫、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福田赳氏、中曾根康弘），现除了持最后一根接力棒的中曾根外，其他人都已完成了历史使命。现在的新政治秩序正由下一代接班人在摸索建立之中。时代的潮流在变化，田中主人再想作为旗手冲锋在前，也只能是我的妄想了。一代天骄——田中时代闭幕了。

他倒于疾病。生病，这对每个健康的人来说都是难以预测的，难以逃脱的命运和自然规律。我和爱戴田中的广大民众怀着同样的心情，盼望他在洛克希德案件的法庭上取得最

终的胜利，向天下人民宣布他是清白无辜的，衷心祝愿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田中主人迎来安闲的日子。在严酷的悲喜剧式的社会现实中，无情的日本舆论界正要把他作为一个年老体残的刑事被告人和在夕阳下歇息的拖着病体的一般百姓赶到历史的尽头。曾几何时，田中被视为罕见的天才政治家而受到好评，为人民所亲近，自然也使一些人望而生畏。我不相信，同一个田中角荣竟会如此蒙冤受辱，被丑化到这种田地。我的主人田中扎根于日本的风土，活在广大的日本人民心中，活在迎来了转折期的日本政治社会之中。田中角荣是会留芳于世的。

1985年7月9日我结束了长达23年的田中角荣秘书的工作，开始独立于世。从那时至今，从北海道至冲绳，我共举办过134次旅行讲演会，听众近九万人，所到之处各阶层的男女老少纷纷向我了解田中的病情，表达希望“田中重返政坛”的强烈愿望与期待。民众是最正直的，他们有一颗火热的心。对他们，我无言致谢，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呢？现在，我只能代替遗憾地失去语言能力的田中，将他有关日本前进方向的论述作为他给各方人士的信件转达给大家，使大家了解这位人类学的权威，这位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现实的人——田中的思想。为此，我决定向读者奉献此书。我完全明白，这样做是超越了我的权限，我准备无条件地接受我主人的指责。同时，我还继续等待着有朝一日能听到我主人“早坂，快来”的亲切喊话。

早坂茂三

昭和六十二年四月（1987年4月）

春寒之时于

东京目黑本宅

目 录

序 章

一个时代的始末	1
---------------	---

第一章

青年议员田中角荣目睹的战后民主政治	14
-------------------------	----

第二章

池田、佐藤项梁柱的十年	36
-------------------	----

第三章

“列岛改造”是田中政治的主旋律	59
-----------------------	----

第四章

关于教育、职业和宗教的观点和见解	87
------------------------	----

第五章

贸易自由化、经济自由化的本质	105
----------------------	-----

第六章

决断与实行——田中内阁风波之始	133
-----------------------	-----

第七章

日苏外交史上的田中、勃列日涅夫会谈	151
-------------------------	-----

第八章

对政治家、官僚、政党的评价	172
---------------------	-----

第九章

自民党最大派系田中派的作用与业绩	193
------------------------	-----

序章——一个时代的始末

田中角荣病倒

电话铃响了。我拿起听筒听到：“早坂先生，了不得了！老头子倒下去了！”——这是来自自自由田中事务所的紧急联络。我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下午五点十五分。

“倒在哪里？是洋灰地上，还是碎石路上，是走廊、楼梯、厕所、草垫上还是床上？”我急切地问。

“躺在床上了。”

“跟医院联系上了吗？”我又问。

“事情发生后，马上就和东京递信医院的加岛主治医生联系上了，他说马上赶来。”

电话中，我把能想到的必要措施都告诉了对方。诸如，不要叫急救车，专调一辆医院接送病人的车，用胶条把车号贴起来，接人时以普通速度行驶，不要飞驰，进大门时要缓行，大家不要在院子里慌慌张张地乱跑，要象平时一样应付外来的电话。总之，不要向外透漏一点风声，我马上就赶到。

这是1985年2月27日。我和往常一样到平河町田中事务所上班。这天我感到闷热烦燥、全身懒倦。下午三点钟我下班回家，洗了个热水澡就上床睡觉了。正迷迷糊糊要入睡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我撂下电话，急忙穿好衣服，坐上出租车，直奔目白田中的家。

这是老头子第三次发病。幸亏前两次比较轻，这第三次就不那么容易痊愈了。我坐在出租车里心潮起伏，如果我到达田中家，老头子已不幸阖上了眼，我该怎么办？需要处理哪些事，采取哪些措施，先后顺序怎么排？想着想着，我把提包放在膝盖上，打开笔记本，记下了想到的种种事情。

车至目白，我急忙跑上主房的二楼。这时，加岛博士和其他医师护士已经到了，正和田中的家属一起，麻利地为病人治疗。老头子躺在床上，几乎处于昏睡状态，我不由自主地松了一口气。虽然医务人员都到了，还是需要把病人送医院。经妥善安排，田中顺利地住进了医院，并立即进行CT检查。听说，特别病房已经有人住了。

“是谁住在特别病房？”我问。

“是前建设大臣渡边荣一先生，……要作……检查，”院方回答说。

渡边先生是岐阜县二区选举出来的自民党众议员、星期

四俱乐部（田中派）的成员。我请求院方在特别病房附近另找了间病房，又飞快跑到渡边住的特别病房。我走进门内，向正在洗澡的议员说：“先生，我是早坂。很抱歉，能不能把你这间房子让出来，旁边已另给您准备好了一间。”我这突如其来的请求，使渡边先生裹着浴巾就出来了。我接着说：“先生，请您不要询问原因了，将来总会向您致谢……”渡边先生不愧是政治家，听了我这几句话，说声“明白了”，就马上开始搬房。对他的这一协助，我深表感谢。

老头子搬进了新病房，医务人员和家属团团围在他的周围。我在另外的房间里和渡边院长、加岛医师等协商今后的对策。据医生说，老头子的病情相当严重，CT检查的结果证明，由于脑血栓，大脑左侧、控制语言的中枢部门损伤，即便没有生命危险，以后的政治活动不可能不受影响。何时恢复语言能力，也不可预测。我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和医生翻来覆去地磋商。

田中的家属和医院事务长等人也参加了我们的协商。当问到“田中住院的消息有没有透露给外界”时，事务长的脸色变了，我下意识地大声追问道：“已透露出去了？”他说已告诉了该院的上级部门——邮政省的主管课长了。我顿时感到茫然。我料想，这位课长听了这个消息，必然跟官房长官、事务次官联系，很快就会传到中曾根的耳朵里。于是，我马上和邮政大臣佐藤惠取得联系，请他“密切注意一切动静”，佐藤表示“一切明白”。这是当晚九点半的事情。我看着认真运筹治疗方案的医生和辛勤进行治疗护理的护士们，心中暗自揣摸会不会从他们口中走漏风声。患者是日本政界实力最强的人，倘若他长期不能发挥政治家的职能，不

仅会给自民党内部，而且会给政界带来或大或小的影响和变化。就田中派本身来说，还存在着创政会这颗定时炸弹呢！不过中曾根即便掌握了老头子的病情，也不会作出什么意外的事情。问题是新闻界，田中病倒的消息总有一天会传进他们的耳朵，东京不是莫斯科，不是北京，要封锁情报是不可能的，如果传得快，等不到天亮，他们就会象猎犬一样出现在医院的门前。记者招待会是要开的，怎么应付他们呢？想到这里，我走到另一间房里给官房长官后藤田正晴家打电话：“田中病倒了，病情不轻”。

“好，我就去。”我又说：“请二阶堂会长、小泽（辰男）事务总长也来吧！”

“当然，也请他们去！”

不到30分钟，二阶堂、小泽和后藤田就赶到医院，又开始了与医治班子的联合协商。深入的讨论持续了近两个小时。简单地说，二阶堂等人的意见可概括为一句话：“田中的脑子不行了”。最后，他们向大夫讲了声“全靠大夫们了，请多帮助”之后，就分别告辞了。此时，已是午夜十二点了。经再次与家属、医生从各方面、各种角度考虑，决定隐瞒病名，目前只当作RIND（可逆性虚血性神经障碍），即轻度脑溢血对外发表，以此争取治疗、恢复的时间。这样作虽然可以说是保护日本政界首脑的苦肉计，也是我极力向院方要求的，但后来给渡边院长为首的治疗班子带来莫大的麻烦。在此，我谨向尽力张罗而又担当风险的所有先生们表示深切的歉意。

总之，大致的方针确定下来了。我又给二阶堂、小泽和后藤田打电话，转达了我们与院方商定的结论，取得了他们

的谅解。当我意识到需要陪住时，为取换洗的衣服，我决定回家一趟。凌晨四点我走出医院，顿感寒气袭人，仿佛有股冷气从脚下向上卷过我的全身。我坐进事先准备好的汽车，当打开油门，汽车将要开动的时候，借着灯光我发现车前方停着一辆日本广播协会（NHK）的汽车。

汽车在驶进，我眼前显现出一片早晨的喧哗景象。我耽于沉思，从此政治家田中角荣的时代也许就要结束了。车继续向我家奔驰。

光阴似箭，这已是整整两年以前的事了。尽管我的主人田中有了很大的康复，但至今仍没有重新登上日本的政治舞台，而我也违心地离开了他，脱离了过去的“主仆”关系，真象是断了线的风筝。往事历历在目，犹如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

我与主人的初会

人与人的邂逅、结合，是不可思议的。我只能说是命运，是缘分，是神灵的召唤。

我第一次见到自民党议员田中角荣，是1960年年底。当时，我是《东京时报》的政治部记者，负责采访自民党，几乎每天都在设于东京平河町的砂防会馆内自民党本部的四楼记者俱乐部（即平河俱乐部）里度过。由于正值编制新的年度预算，国会议员、各省厅的头头们及反映情况的各团体，匆忙而频繁地出入于自民党本部。

在记者伙伴们“会见、会见！”的呼叫声中，我们来到了会见记者用的大桌子前，只见一个蓄着小胡子的精悍男子

大步流星地来到桌前坐下，他就是田中角荣。

时令已入严冬，而自民党开发水利资源特别委员会田中委员长，却手持扇子，边扇边快速地讲解着“开发水利资源促进法”、“水利资源开发公团法”的立法问题。“仅仅从治山治水的角度考虑水的问题是错误的。水是宝贵的资源。十年以后，十五年以后，光是工业用水、农业用水和生活用水需要多少？现在就要做出估计，尽早考虑和确定有关开发和有效地充分利用水利资源的方法和安排。”田中手中连个记事本也没拿，却连连列举出各种数字加以说明。听他演讲的记者只有七八个人，其他记者有背对田中打电话的，有写稿子的，同时，屏风对面不时传出“唰唰”地搓麻将的声音。记者们对自民党三位最高领导人的讲话还马马虎虎有点兴趣，而对政务调查会的一个方面的问题则不感兴趣。而田中对记者俱乐部的这种气氛全不在意，仍然兴致勃勃地讲自己所要讲的问题，最后，他总结性地说：“总有一天要搞出个名堂来的”，之后便一阵风似的离去了。在此顺便提一下，以上田中提到的两个法案于1961年1月13日的第三十八次国会上都通过了。

这就是我与田中角荣的初次会面。我们没有谈话，也没有交换名片；而他的思路之敏捷、计算之擅长、精力之充沛的特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年他42岁。两年之后，我担任田中大臣的秘书，负责事务工作。从这时起，到1985年7月9日开办个人事务所独立工作为止，作为天才政治家田中角荣的不肖弟子跟从他整整23年。

时至今日，回首往昔，我总感到，象我这样的人，之所以能够和田中角荣这么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阴差阳错地走过

了共同的人生道路，它不能不使我感到是命运的戏谑。

田中生于雪国新泻县偏僻的乡村，小学高等科（日本的旧学制，六年小学毕业后入学，学制两年）毕业后只身来到东京，边工作，边上夜校，十八岁开始开办自己的设计事务所，整个青年时代都是在苦战奋斗中度过，成为一个杰出的青年实业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及时地选择了政治家的道路，28岁首次当选为议员。仅从此简短的政治生涯，亦不难看出田中是一个靠个人长期艰苦奋斗而成名的传奇人物。

我当记者时，主要负责采访以佐藤荣为首的自民党方面的工作，经常出入于设立在赤坂区溜池大楼内的周山会（佐藤派）事务所和位于世田谷区淡岛的佐藤私邸。在此期间，时常耳闻有关田中的情况。知道他只高小毕业，当过土木建筑公司的社长，现在是佐藤派的骨干，全面负责佐藤派的财务。他39岁出任邮政大臣，有一次竟断然批准为36家民营电视台发放营业执照，令世人大为震惊。他聪明过人，出类拔萃，尤其在数学方面特别灵通，过目不忘。他记忆力之强，为秀才出身的官僚们所倾倒。众人的名单，他能从头到尾地背下来；与生人见一面，便能记熟，诸官吏的年纪顺序也一清二楚，从不会记错。他许诺的事，一定实行，办不到的事从不随便答应，不干没着落的事情。对他人的照料体贴可称天下第一，他只要知道你哪里不舒服，会立即从老远跑过来，尽力为你解除痛苦，苦心安慰。他是吵架的能手，见有取胜的可能，就死咬不放，力争获胜，同时又很灵活，一旦发现自己敌不过对方，就急忙退却，溜之乎也。他手疾眼快，善于雄辩，讲起话来就象开机关枪一样使人哑然，又象开闸

的江水一般滔滔不绝令人难以抵挡。遇到桌面上难以启口的问题，他又是串门走访、通融协商的高手。要说喝酒，他堪称海量，酒席上十分活跃，能唱浪花节、小调、都都逸及他熟悉的歌曲……他人缘好，很能取悦于女性。

耳闻田中上述特点，使我产生了“此人还是不接近为宜”的想法。因为我有一种被拉下水的预感。但是，1962年2月初，他与我之间发生了下述“事件”。

当时，美国司法长官罗伯特·肯尼迪（后被暗杀）访日，2月6日田中角荣、中曾根康弘、江崎真澄、石田博英、宫泽喜一、山中贞则等自民党首脑和他在六本木国际文化会馆举行了非正式恳谈。恳谈会上肯尼迪提出希望日本增强防卫力量的问题。田中反驳说：“你讲的诚然有道理，不过，美国强加给战败国日本的宪法已在我国扎了根，若有哪届内阁想砍掉它的主要枝干，这个内阁就会被推翻，若把它连根拔掉，整个日本就会闹翻天。但我们也不能总让你们背着、抱着走。如果非要‘增加防卫力量’不可的话，难道美国不该向日本国民讲解一下日本国宪法的制定过程吗？”

田中角荣滔滔不绝地作了以上论述之后，提出了“以归还冲绳为前提，美方再向日方提出修改日本宪法和日本重新武装军队的问题”的提议。

当时，田中担任自民党政调会长的职务，是自民党三巨头之一。尽管这是个非正式的会晤，但田中的发言的确有问题。我抓住他的发言，经向与会议员核实确认后，写了一篇题为“田中发言”的报道，刊登在次日（2月7日）《东京时报》晨版的头版头条，反响极大。此时恰逢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开会，社会党提出“不能允许自民党三巨头信口开河，

要追究自民党的责任”，为此，国会的审议讨论不得不中止。我们报社可以说是个小报社，但我挥动一下铅笔，竟使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哗然，老实说，当我看到这种情况，我感到气粗力壮了。

“事件”的中心人物田中遭到声讨，“辞职”、“谢罪”、“剃掉小胡子”的喊声一片，使他不得不躲在自己的家中，表示以后要“慎重”。而我与田中并无怨仇，我想到他那里自报姓名，说“那个报道是我写的”。于是，8号晚上我便有生以来第一次跨进田中的家门，请传达室的人帮助转达，此时，我已作好被赶走的思想准备，但没料到竟轻而易举地让我进去了。我在会客室里稍等片刻，老头子身着和服出现在我的面前。他满面红光，毫无沮丧之感。“啊，是你，我认识你。”他说着欣然一笑。我便开门见山，扼要地谈了事情的经过，表达了我对他的歉意，当我要告辞时，他说：“没事儿，我不是挺好吗！政治家的工作就是要让人家评说，让人家报道。这次你胜了，不过，你不要担心，骚乱很快会平息下去，在野党要不了我的脑袋。你能来一趟，这很好，今后常来玩！”

田中满面笑容地与我握手告别。在返回的途中，我在车上活动着被他握得发麻的右手，感到放心了，佩服之心油然而起，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我想，我的报道也许会使他在政治上遭到莫大挫折，而他却是那么沉着自如，毫不惊慌。他那无忧无虑的笑脸又说明了什么呢？我从事记者工作7年多，所见到的政治家、政府官僚大多是职业性的脸笑眼不笑，而田中的笑，不仅是眼、嘴、脸在笑，而且浑身充满了笑意，他就是以这样的笑来迎送我的，也许这正是田中令

我倾倒之处。

“角荣不凡”——在返回位于新桥的报社的路上，这个概念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田中纠纷”果真按他的预言了结了。从10号开始国会的审议又走上了正轨。田中政调会长若无其事地照常活跃起来。当时，田中的爱女真纪子正在美国上高中，“纠纷”发生后，她来电报说：“爸爸，胡子不要剃掉”。这封电报，不久我便知道了。我认为，我这次去目白访问，正是新闻记者的我与在自民党内正急速显露头角的田中角荣结合起来的直接引子。

由于这个事件，我和我主人的关系日益亲密起来。当时，负责采访佐藤派的记者们，多数热衷于捕捉佐藤荣作、保利茂、爱知揆一等头面人物的消息，与年轻的田中频繁接触的却只有我和其他两三个人。

这年7月18日，池田内阁第二次实行人事改革，田中被提拔为大藏大臣，是年44岁，成为前所未有的年轻大臣，至今仍然没有人打破这个纪录。此后直至1965年6月3日，他连任池田、佐藤两内阁的三届大藏大臣。在此期间，田中的至友大平正芳也由内阁官房长官转任外务大臣。这出好戏的脚本是田中与大平合作的产物。大野伴睦、河野一郎抓住两个年轻人（当时大平51岁）占据了内阁的两个要职，在报上喧闹了一番。组阁的第二天，我在《东京时报》上以“H”的笔名发表了题为《自民党内新的波涛》的长篇报道。当时，这篇报道从正在搜集世界各地的话题的法国电影界新闻波涛运动得到了启示。在这篇文章中我曾写过这么一段话：“不久的将来，田中、大平将肩负起自民党的重任，新的时代已翘首可望。”

时入12月，田中问我：“当我的秘书吗？”对此我权衡良久。学生时代我曾加入过日共，亲身感受到左翼是没有实力建立人民战线政府的，而自民党政权将会持续下去，因为自民党已深入各阶层的民众之中，这已形成了当时日本的政治气候，左翼的意志和希望若不借助于右翼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此外，与社会党和共产党比，自民党人材济济，其中就包括田中这样杰出的人物。就田中本人的个性而言，他那精明强干、毫无虚张、心直口快，博得众人所喜爱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我。我终于做出了抉择。几天后我向田中表示了同意的意见，“请多关照”。随即便向冈村社长申请退出报社。日本战败之后，同盟通讯社（现共同通讯社）社会部部长冈村和佐藤八郎、或场隆三郎等在一片焦土的东京创建了报社，他们是真正的新闻工作者，不辞辛苦而乐在其中。

冈村听了我退社的申请之后说：“是吗！？那太好了。田中先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男子，而且也是一位大有希望的人。你要努力工作，得到他的喜欢。那么就这么着了。”然后他又笑着说：“该给你些退职金，现在手头没有，就把这些拿去吧！”说着他从西服的内兜里取出钱夹，把里面全部的钱都掏出来放在桌子上，共七万八千日元，相当于当时我三个多月的工资。我把这些珍贵的钱揣进衣兜，向社长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一溜小步地下了楼。一路上我想起冈村对我的好处，不禁流下泪来。当时的景象，至今记忆犹新。

1962年12月10日，我领取了大藏大臣事务秘书的任命书。这天田中给我的教育使我终生难忘。我向大藏省处级以上干部一一致礼之后，来到大臣室，向田中作了汇报。没料他突如其来地说：“你鞠个躬我看一看”，我虽心里挺光